

十里洋场的侧影

谢菊曾

# 十里洋场的侧影

谢菊曾

花城出版社

# 十里洋场的侧影

——虹居随笔

谢菊曾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五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2插图 120,000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500册

书号 10261·237 定价 0.67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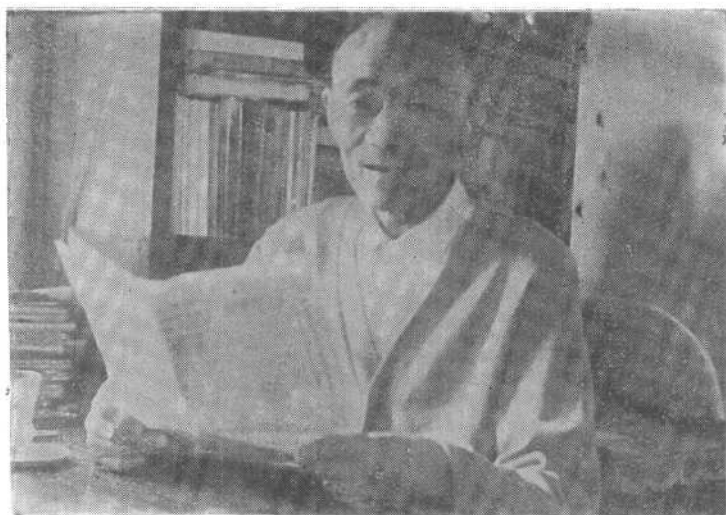
## 内 容 提 要

谢菊曾著的《十里洋场的侧影》，从文史、出版、银行、街道、人物等各个方面，反映了自本世纪初至解放前夕数十年间旧上海的烟云情状，是旧中国的一个侧影，也是一个老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真实纪录。它对了解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旧上海，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作者经历了清末以来的各个时期，一直生活在上海，小时在声誉甚高的尚公小学读书，少年时便发表翻译作品和写作童话故事，尔后进入创办不久而文人荟集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青年时代以后一直在中华银行从事经济工作，观察、思考、志记社会事物和见闻不少，并长时间地与各方面的人士保持联系，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素材，很有参考价值。

《十里洋场的侧影》分五个部份：《涵芬楼往事》一辑：细写当年商务印书馆关于人事、编务、制度、印刷、稿酬、社交及与作者关系的种种内情；《哈同谈屑》一辑：反映犹太人哈同等西洋冒险家在上海大发横财、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给民族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和灾难的种种罪恶行径；《四明银行琐记》一辑：记载银行、钱庄行业内部互相倾轧、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六十年前的北四川路》一辑，描述了旧上海闹市区福州路、宝山路一带的兴替、变迁和掌故；《我的业余写作生活》一辑：忆述作者从少年至晚年业余写作生涯中的种种追求和情趣。

作者文风朴实，文字流畅，读来颇感亲切。



作者像

## 谢宜鹏给编者的信

(代序)

×××同志：

您六月二十一日发的信已收到，谢谢。

家父的《十里洋场的侧影——虹居随笔》，……可望出版，作为家属的我们，由衷地表示感谢。……下面提供一些情况，仍恳请伯伯，为此书出版写篇序或前言之类的短文。

《十里洋场的侧影——虹居随笔》的定名是有一段缘由的。八年抗战胜利，我们全家从上海市静安区的康定路迁移至虹口区四川北路。这是一幢老式石库门楼房，是一家私营银行的产业。我们定居在虹口区后，父亲想此后可有一番好的作为，在天井辟了花坛种花，开始过上安稳的日子。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人民生活无保障。为维持一家生计，父亲除了每天早出晚归，替银行资本家卖命外，还不得不勤奋写稿，以攒取微薄的稿酬养家糊口。每当我们睡下时，父亲房内一盏灯总是亮着……上海解放了，父亲和所有的劳动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他对共产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先后送我们兄弟进革命大学和部队的熔炉里去锻炼；他自己也脱离了私营的银行，参加了革命，进入华东财委工作，之后，转

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工作，直到他一九六一年大病退休时为止。解放后，生活有了保障，父亲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上海各报的副刊写一些回忆旧上海的故事，告诉我们青年人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值父亲退休在家；这时，他除了为商务印书馆译一本英文版的约四十多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对华贸易史》外，写作更勤了。有时，我们劝父亲要注意身体、多休息，他总是乐呵呵地对我们说：写作是我的爱好，一天不写，好象缺了什么似的；何况青年人不了解过去，我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经历过的写出来，帮助青年人了解过去。就这样，父亲从退休到“文革”前，在五、六年时间里除了译完《印度尼西亚对华贸易史》的初稿外，还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学术月刊》等报刊，先后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内容有经济史话、旧上海的故事、文史掌故、银钱业职工斗争史等等。

十年浩劫期间，这是使父亲最感痛苦的时期。肉体上的痛苦尚能忍受，而精神上的痛苦是无法弥补的。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所有的书籍、资料、日记全被抄走了。我们一家三代被挤在斗室里，连放一张书桌的地方也没有……但这一切没压垮父亲对党的坚强信心，他还常对我们子女说，要相信党。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父亲也没有放下他的笔。每当孙儿们上学去了，他就伏在仅有的一张吃饭桌上写他的回忆录，那练习簿上工工整整的用钢笔誊写的蝇头小字，倾注了父亲多少心血！就这样，一年复一年，父亲用他

顽强的毅力，惊人的记忆力写下了这一、二十万字的回忆录。严冬毕竟要过去，“四人帮”倒台了，中国大地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父亲是年七十五岁，他高兴极了，写诗填词，还兴奋地对们说：我要把有生之年，贡献给祖国的“四化”建设。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国银行在汇编解放前上海银钱业资料过程中，银行有什么咨询，父亲总有求必应，提供所需资料。广东《随笔》创刊，父亲当即寄稿，后来差不多每期都来约父亲写《涵芬楼往事》。父亲精神振奋，不停地写，被剥夺了十年的业余写作这股压抑的火焰，犹如火山喷发一样，不可收拾。一九八〇年初父亲被病魔缠身，他却不在意，仍然每天坚持看书读报，伏案写作四、五小时；到了六、七月病势严重，上午我们陪伴他去就诊，下午他还是在写《涵芬楼往事》的续稿；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待秋凉后，身体定会好转，届时要重新把《十里洋场的侧影——虹居随笔》修订一遍……万万没料到是年八月五日病魔夺去了我们的父亲。父亲享年七十九岁。父亲的一生，在《十里洋场的侧影——虹居随笔》中都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如果说这是一本回忆录也未尝不可。它反映了一个老年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余话以后再谈。专此即祝

暑安

谢宜鹏

一九八二，七，八。



## 目 录

谢宜鹏给编者的信（代序） .....	1
种花记 .....	1
涵芬楼往事 .....	14
宋版《玉篇》和仿宋活体字 .....	15
《清稗类钞》是怎样成书的？ .....	16
许指严和《乾隆南巡秘记》 .....	17
林纾稿费的找补 .....	18
《说部丛书》和《林译小说》 .....	19
蒋竹庄的官兴 .....	20
寄宿舍的裁撤 .....	22
高梦旦落拓不羁 .....	23
孙毓修与儿童文学 .....	25
梁任公的《国民浅训》和《盾鼻集》 .....	27
理化部和《东方杂话》 .....	29
《小说月报》史话 .....	30
《教育杂志》的变迁 .....	32
《学生杂志》和几位投稿人 .....	34

《少年杂志》的变迁	36
《妇女杂志》的种种	38
李涵秋与《雪莲日记》	40
涵芬楼出名医	41
《英文杂志》和《英语周刊》	43
英文部的人物	45
英语课本的沧桑	46
甘作霖书空咄咄	47
函授学社“英文科”	48
英文辞典和王蕴章的序	49
童世亨与中国舆地学社	51
中国图书公司的被收买	51
上海滩上的第一个“廉价部”	52
出版部老少两矮子	54
张菊生和他的长随老张	54
徐仲可与杂纂部	55
图画部与美术、体育	56
字典部与阳湖耆宿	58
抢聘苏州一师附小教师	60
六十年前的北四川路	62
六十年前的宝山路	71
六十年前的福州路	76
六十年前的棋盘街	82

六十年前的北京东路 .....	87
尚公小学闲话 .....	93
哈同谈屑 .....	104
禁烟焚土的小插曲 .....	112
孙中山与中华银行 .....	116
光华火油公司沧桑史 .....	120
四明银行琐记 .....	122
长城保险公司偶忆 .....	126
我的业余写作生活 .....	134

## 种 花 记

据说我的本生曾祖父擅长种花，尤其是菊花，因此取了“鞠庵”的号（父亲给我取号菊曾就是从这儿来的），可是他早在我出生前十多年去世了。我幼时只见到敏人二叔祖在他的书屋旁边，辟有几分土地种着鸡冠、凤仙、月季之类，同时还有几盆兰花放在花架上，秋天则点缀着好些菊花，后来又从上海引进了一些大丽菊和一丈红等，使这块小园地充满了生意。书屋是三间矮平房，延了一位老学究，教几位子弟的书。我是不在这个私塾里读书的，但每天放学后经常到那儿去玩。曾有一时老学究因事回家，我的小叔正从上海回来，叔祖请他去代课。他把当时国势险危，列强环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等等向学生详细讲解，大家闻所未闻，一齐激发爱国热情，有的甚至急得痛哭流涕，我即是其中之一。不久老学究回塾，依旧教他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简称“三百千”），我也不再跨进这书屋，只是向叔祖讨得几株鸡冠和凤仙，拿回家中，种在仅有的一个碎砖砌成的小花坛中，每天注视着它们的生长，直到开花结子，感到很好玩。稍后又觉得这样不过瘾，于是就在屋旁的一块占

地三分的蔬菜园地里，在芥菜、萝卜中间，也种上一些鸡冠、风仙。这块园地原是族人的，祖父租来后，承邻居贵老太公（一位极富正义感的老贫农）帮忙，在四周遍种了辛夷树，这种树枝条茂密，而且相互挤得很紧凑，构成天然篱笆，春夏间还开着酒盅般红色的花，很是娇艳。园里原是种着几种日常蔬菜，但因没有专人照料，每年播下种子后，便听之任之，因此杂草丛生。某次我从比我高出许多的杂草中发现一株枝干茁壮的草本，忙请祖父来看，他一见便说这是牛蒡子，可入药的，又指出另一株枝叶蓬勃的草本说，这是香蒿，夏天可以泡茶当饮料解暑气的。经这一来，格外引起了我的兴趣。此后经常去田野里巡视，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植物便掘来移植园中。与此同时，祖父从亲友处得到三株从北京带来的葡萄苗，便种在中西首侧屋旁，不久抽芽吐叶，藤蔓缓缓地爬上屋顶。于是祖父购了木料特地雇工搭起一个棚，把葡萄藤引到棚上。次年枝叶更见繁茂，到了第三年春天，整个棚都被枝叶盖住，开着绿色小花，随后结成一串串珍珠般的果实，初作青色，随着颗粒的逐步壮大，颜色由青转淡黄再转微红，最后呈现紫色，标志着已是十分成熟，可以采摘了。当时祖父对之很是高兴，我也分享着祖父的快乐，每晨起来即守在葡萄棚下，因为有一种鸟儿唤做白头翁，最喜偷啄葡萄，好在此时正值暑假，我便整天担任“警卫”之职。当葡萄成熟开摘的时候，全家动员，大人们扛来一张方桌放在棚下，人就站在桌上，用剪刀向头顶上一串串的葡萄开剪。经过几天剪摘，累累下坠的珍珠串儿几乎绝迹，可是结在棚

顶上面的葡萄还是不少，这就需要爬到棚上去采摘了，当时有二位堂兄，身子很矫捷，便担任了这个职司，我见猎心喜，在他们帮助之下，也学会爬树的本领，两手抱住木柱，两脚脚心搓着木柱下端，逐步攀援而上，直到坐在顶上为止。但我当时的快乐，不在于此，而是在奉命致送葡萄给亲友们这一“肥缺”。由于祖父说这东西不能多吃，多吃了会引起肚子泻，因此不让我多吃，他把整串整串的葡萄，用竹篮盛着，叫我分头去送给邻居和亲友房族等，请他们大家尝尝味道。当我送去时有的公公婆婆、伯伯叔叔硬要给我在篮上放些自做的花生糖、盐砂豆、山芋干等，带回来给祖父看过后，就够我享用了！记得有一次奉祖父命送葡萄给族叔祖鲁珍公公（他是国学大师，系父亲的老师，思想极开通，当时把小儿子送到南京武备学堂即南洋陆师学堂去读书，在全县尚少见），他硬要我带回四只蛋饼（蛋糕的一种），祖父就给了我，我把一只送进嘴里，感觉味道不对头，赶忙吐出，才发现已发霉变质，大呼上当不置。后来了解这些蛋饼还是春节他买来祭祖，用过后保存着一直不舍得吃，祖父为此向我讲解俭德的可贵，这样一来，不由我不对他肃然起敬了！葡萄种到第三、四年以后，逐渐衰落，等到我十一岁那年，那几株葡萄已经除掉，连葡萄棚也拆去了。（可是我们大家至今还称这一段地方为“葡萄棚下”）我于这年走出私塾到离家三里许的“承志”初等小学堂读书，晚上宿在校中，星期日回家一次。到了秋间，祖父因病去世，这是我在人生路上第一次尝到生离死别的痛苦，当然没有心情去过问闲事了。十

二岁升入“诚意”高等小学堂，十三岁随着全家迁居上海，最初住在横浜桥丁兴里（目下虹口科技馆原址），二月后又搬入东宝兴路广吉里（即目下的和平坊）。我到了上海后，父亲送我进打铁浜（目下马当路南段）“通惠”小学校插入高小二年级，作为寄宿生。这校是水木作业设立，地方很大，前后校园遍种菊花，鲜艳夺目。由于我在乡下学校所读的英文程度太浅，而此校又特别注重英文，因此英文功课无法赶上。尽管我每周所做的国文论说，获得老师赞许，经常揭示在“学生新闻”上面，可是终抵不过英文一门的尴尬相，经常为此发愁再也没有心思去欣赏校园花木。次年改进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尚公”小学，因没有高三班，只好仍插入高二。此校校舍租自民房，系东洋式房屋六幢，面前只有一块小小空地，逢体操课全体须排队到隔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花园去上课，校内连一株杂草也找不到。次年秋季开学之后，商务印书馆在印刷厂旁边即该校南首购下了二亩许地皮，给该校兴建了一座校舍，除将校舍南面一大片空地辟作操场外，并把后面左右两块小空地辟作校园，用砖头拦成若干小块，每级占有一块，各自种上花木。可是校舍落成迁入，我班已经毕业，轮不到我们在校园劳动，不过我继续在新校舍寄宿（日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朝出晚归却也同样分享着校园的乐趣。就在这年农历端午，我想起在乡下时，常见敏人叔祖剪了石腊红小枝，插在土中，不久即能生根抽叶开花，因此照样从校园里剪得一枝，插在一只装上泥土的小铁罐里。这天正下雨，便放在露天过夜。次日起床一看，原来罐

底没有钻洞，雨水无法排泄，积水满罐，把枝干都烂掉了，于是打消了种花的念头。

一九一七年春初，我改进中华银行学业。这家银行是小型商业银行，设在福州路十三号，三开间门面，没有天井或后院，当然不会有什么花草。次年该处房屋被房东卖给贴邻的日商三井洋行，中华银行只好迁让，经过多方寻觅，最后在北京东路河南路东首找得一块地皮租地造屋，于一九一八年岁暮工竣迁入。新行址的营业厅后面是天井，中间是走廊，搭成玻璃天棚，两旁露天里，各放着四只高大瓷花盆架，架上花瓶分别种着夹竹桃和松柏之类，于是重新引起我对花草的兴趣。可惜后来由于无人照管，这几盆东西相继枯萎，接着天井全部搭盖，天棚同营业厅打通，那些花盆架便被丢在晒台的一角。恰巧我的卧室有门直通晒台，我即于春间在花盆上撒下几粒凤仙花籽，过了些时即苗芽，渐见成长，到了阴历六月居然开了很多花，大大鼓起了我的劲头。夏天太阳猛烈，每到下午花枝即倒伏，因此除了朝晚浇水之外，还特地于午后上楼把花盆搬进卧室，傍晚再行搬出，真是为这些小生命费尽了气力。当时我们这间卧室连我共住三人，职工宁波人居多，由于该银行星期日照常办公，所以每年可以回里探亲住上一、两月，去时照例把铺盖、行李全部带走，这样逢到其余二位同事先后返里，房间里空洞洞地只剩下我和我的东西，于是我便把晒台上所种的几盆草花，轮流掉换放到卧室里，作为点缀。有时还特地到城隍庙花摊上买几盆海棠和石腊红，把房间布置的更美化，晚上看书赏花，倒也



自得其乐。就这样，我在这里度过了我最宝贵的青春。

一九三一年八月，我转到垦业银行工作，一时对“故居”有些恋恋不舍，晚上仍寄宿老地方，直到次年六月，把小家庭安顿于提篮桥保定路，才与朝夕相处十五年的北京路清远里口的一角小楼告别。

保定路租的是一幢单间石库门，那时双亲同弟妹住在南市，平时我朝出晚归，星期日例去问候双亲，因此白日很少在家。但当春夏之交，天日渐长，每天下班回来，天尚未暗；早晨六时起床八时出门，中间有二小时在家，有时感到无聊，不免又想种些花草，以资消遣，可是天井全部是水门汀，无从着手。不久正念向我反映，说对过马路弄内一家邻居，挖去了天井里部分水泥，填上泥土，种下花草，很是不错，不过我想这样做必须“兴师动众”，单靠个人无能为力，只好打消此念。这年腊月碰到花贩挑了担子上门兜售，便买了两盆凤尾草，代价七角，放在客堂茶几上，即作为春节“清供”。次年春天又添买了几盆草花，这时适值大房东周某去世，家道中落，他家庭院里放着几只梯形花架，空着无用，正念就去借了一只放在我家天井，于是几盆花草总算也得了一个安身之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上海人心激昂万分，本市日本“驻屯军”借口中国人民抗日，向本国调兵遣将，形势日趋紧张，我家于八月一日离开保定路，迁到西区康定路（当时称康脑脱路），到这月十三日终于展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